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薪火映黔山**

南迁文物箱件途经文华殿。  
故宫博物院档案馆(院史陈列馆)供图

**27° 黑土地 人文**

故宫文物南迁路线图。  
故宫博物院档案馆(院史陈列馆)供图

**八十年抗战中的国宝南迁**

80多年前,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为避免日寇劫掠、战火毁损,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自1933年2月起南迁存于上海、南京,1937年11月后又疏散西迁分3路到西南。困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作为西南大后方的贵州,迎来了西迁南路的故宫文物。在无数国人的努力和守护下,故宫文物在此安然栖居。故宫文物是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与见证,在炮火硝烟中,保全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故宫文物南迁过程虽历经艰难曲折,但在故宫博物院与地方政府、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守护了国宝的安全,文物基本完整保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曾说,“故宫文物南迁史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历史,也是国家、民族的一段历史”。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徐婉玲**

散氏盘与铭文拓本的合拍。故宫博物院档案馆(院史陈列馆)供图

**八十箱故宫文物秘藏贵州**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姚曼

陈恒安书写的《故宫博物院在筑书画展目录》。  
马宏明 摄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厅内的中国瓷器。  
故宫博物院档案馆(院史陈列馆)供图

**国宝藏贵州**

华严洞临时库房剖视图。  
故宫博物院档案馆(院史陈列馆)供图

**80箱文物“珍品中的珍品”**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平津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择选重要文物南迁。故官人带着国宝历尽艰难,展开了行程数万里的迁徙之路。在社会各界与各地民众的守护下,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行程最长的文物大迁徙,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贵州省是故官迁徙文物的重要存放地之一,从贵阳的毛光翔公馆到安顺的华严洞,都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1933年2月到5月,故官博物院13000余箱文物分5批南迁上海,包括文献档案、古籍、陶瓷、青铜器、书画等。4年后南京新修的库房建成,存于上海的所有文物全部运抵南京,藏于金陵名胜朝天宫旁的新库房内。

故官博物院研究馆员、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徐婉玲在接受采访时谈道。1937年,受上海一三事变的影响,已暂存南京的文物又紧急分南路、中路、北路水陆并进,向西转移到更安全的西南大后方。这也是故官文物的第二次大迁徙,西迁的路线有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线路。北路是南京-徐州-郑州-宝鸡-南郑-成都-峨眉,中路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南路是南京-汉口-长沙-桂林-贵阳-安顺-巴县。

南路的文物最早西迁,带走非常重要的80箱文物,这些文物大部分参加过1935年—1936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从上海库房里挑选出来的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宝,都是精品。1935年6月,故官派军舰萨福克号到上海装载中国参展文物,参加11月在伦敦开幕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伦敦艺展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征选文物出国展览,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1936年5月,赴英参展的中国文物安全抵达南京。徐婉玲介绍,西迁南路文物撤离时,除了原有的赴英国展出文物,增加一些青铜重器,书画名作包括限制出境的西周青铜器散氏盘、嘉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

西迁南路文物由故官博物院的庄严负责押运。南路文物中不乏书画精品,有范宽的《群峰霁雪》、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宋徽宗的《腊梅山禽图》等名画,有宋高宗《赐岳飞手敕》,还包括颜真卿、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马远、石涛、唐寅、沈周、文徵明等书画名家之作,可谓“珍品中的珍品”。

1937年8月14日,80箱文物精品,由轮船运离南京,溯长江而上,16日抵汉口,后转运火车至长沙,21日存入湖南大学图书馆。

1938年春,由于战事发展,汉口、长沙也面临随时被轰炸的危险。故官博物院理事会商议决定,存放湖南大学的故官文物紧急转运贵阳。

文物抵英后在皇家艺术学院举办开箱点交仪式。  
故宫博物院档案馆(院史陈列馆)供图

**全民抗战的胜利成果**

故官国宝迁徙到贵州期间,曾赴苏联参展一次,影响空前,起到了在战时促进两国团结的作用。为鼓舞抗战士气,故官博物院还先后在重庆、贵阳等地举办展览,让处于艰苦抗战中的广大民众欣赏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故官博物院在贵阳的书画展是当时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陈桓安促成的,陈桓安是著名的书法家、文物鉴赏家。徐婉玲介绍,由于是战时办展,故官国宝在重庆和贵阳展览期间,两地都制定了应急的预案。贵阳的预案包括选定附近的狮子山及麒麟洞两处为防空地点。展览期间,有车随时留驻科学路广场,以备临时使用。又与防空司令部接洽,如有情况,第一时间电话通知,马上收好展品,派人随车运至防空处所,确保展品安全。

1944年4月,故官博物院书画展分两期在贵阳科学路省立艺术馆举行,展出约200件藏品。《贵州日报》刊载了故官书画展览珍品要目,主要包含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书法、名画精品。如晋代王羲之三帖,以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书法,李唐的《雪江图》、自然的《秋山问道图》、郭熙《早春图》、李嵩的《听阮图》、马远的《雪景图》等绘画,均为国宝级珍品。

展览引起轰动,成为贵阳当时的一大文化盛事,不少外士人闻讯专程赴省城参观。当时《贵州日报》刊载的一篇观后感《走马看奇花——观故官书画展记》,幽默感十足。作者叫遵义的朋友来看展,“你们要不来,你们就白活了”“一进门,我同晋朝王羲之见面前,我就吓了一跳,我心里真想请教他,这一手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这一系列展览活动,如马衡院长所说:“结果不独在阐扬学术与国际声誉方面,已有相当收获,即于启发民智、增进一般民族意识,亦已有影响,成效颇彰。”

1944年秋,黔南事变发生,日军攻入贵州独山,安全遭到威胁的故官文物再次踏上征途,紧急转移至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飞仙岩储藏。12月5日,15辆军用卡车装载文物箱件和押运人员离开安顺,沿着川黔公路前行,并于12月18日抵达飞仙岩矿区临时仓库。全程参与了文物南迁的欧阳道达在《故官文物避寇记》里道:“独山失守,寇氛炽迫;文物再迁,刻不容缓。又经本院在渝市郊外五十公里许,选定资源委员会四川油矿探勘处所属废置未用之飞仙岩矿场,为短期储藏文物之用。”

这批国宝在安顺安稳平顺地待了5年10个月。杜应国说,由于当时战火不止,典守人员生活艰苦。尽管生活窘迫,他们内心却无比从容。庄严曾写诗回忆:“云影山光入座来,华严小住亦悠哉。虽是广文官自冷,尚思为国到轮台。”1938年在贵阳出生的庄严之子,台湾著名摄影家庄灵,跟随父亲护运故官国宝在贵州居住6年,曾应邀参加“多彩贵州·第八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他携作品《梦回安顺·对贵州儿时记忆的重新摄影探访》参展。作品分“故官国宝曾经暂存于贵阳(1938-1939)和安顺(1939-1944)”及“作者眼里的美丽贵州”两部分。他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说,安顺和华严洞是他童年最早的记忆,“每逢假日,父亲常会带着哥哥和我到华严洞去玩。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故官同仁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取出来,在广场上摊开晒晾,我总和兄弟一起好奇地在一旁观看。”

对于在安顺的生活,庄灵回忆说,当时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的“八宝饭”,下饭主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是补丁,晚上全家人其乐融融,在灯芯草作引线、菜油作燃料的灯碗下看书和做功课。

杜应国感叹,在此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故官文物典守人员一丝不苟。防火、防潮、防鼠、防白蚁,对怕潮湿的文物终年检查,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徐婉玲说:“故官文物南迁,保护了中华文明的无上珍品,老一辈故官人和给予南迁积极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现出让人感慨的文化担当和家国情怀。”

后来,文物经清点无一损毁,一路颠沛流离的国宝宛若原初,其实已走过了千山万水。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奋斗历程,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

故官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森在《抗战时期的故官文物南迁》一文中谈到:“故官文物南迁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故官文物在祖国西南10年辗转,基本完好无损,这是社会各界勠力同心护宝的结果,是全民抗战的胜利成果。”

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庄严曾留学日本学习考古学,他对日本的文物保管很有研究。徐婉玲说:“庄严先生在日本调研了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学习他们的管理方法,正仓院类似南方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最大的好处是防潮,库房仿正仓院建造是出于科学保管的考虑。”

杜应国介绍,对于跟随国宝迁到安顺的庄严及其办事处同事来说,肩负特殊使命,却没有画地为牢,而是与地方人士多有接触和交往,也参加一些地方性的文化活动。闲暇之时他们到附近的村寨和山洞探幽寻胜,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春节期间,还到北门外“花山”看苗族跳花,又到距华严洞不远的五官庵观看屯堡地戏。

**专访**

徐婉玲:故官博物院研究馆员、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艺术学博士,主要从事故官博物院史和近代中国博物馆史研究。

徐婉玲。受访者供图

二十世纪三四年代,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为保护国宝,故官博物院的文化工作者护送文物,在抗战烽火中辗转上万公里,播迁10余省份,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迁徙,写下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今年是中国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报记者采访了故官博物院研究馆员、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徐婉玲,听她解读故官文物南迁历史,和她一起回首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一起感悟先辈们的家国大义。

记者:能否请徐馆长介绍一下目前故官文物南迁的一些研究成果?

徐婉玲:2017年6月,故官文物南迁研究所成立。2019年12月,“故官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经过10余年的努力,故官文物南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首先,故官文物西迁档案得到了系统梳理。截至目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等陆续为所藏故官文物南迁档案制定了专项整理方案。此外,根据档案文献整理和史迹实地调研,我们尝试着以展览的方式将这段历史经过和细节展现给观众。2021年至2023年间,多项成果落地。

记者:您认为当时故官文物迁徙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婉玲:在迁徙过程中,文物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且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困难。文物自北平迁往上海的时候,虽然是为了躲避山海关沦陷可能给平津地区带来的战火,但当时的华北地区局势还算相对稳定。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打包装箱,这是一个巨大的基础工作,瓷器和石鼓的打包装箱,都是涉及文物安全的技术活。第二是库房选址,为文物找一个安全的处所,既要考虑交通运输的便捷,又要考虑保存环境的适宜。第三是交通运输,搬迁文物不像搬家,火车需要专列,行进路线需要安全,沿途停靠需要警卫。这些都是巨大的系统工程,即使放在当下的和平环境里,也是极具挑战的事情。

到了存放在南京的文物紧急向西疏散的时候,面对的环境和困难都发生变化。南路的80箱文物,数量虽然少,但都是精品。当它们一路向西疏散,从长沙到贵阳,从贵阳到安顺,当时的故官博物院马衡院长多次指示负责押运文物的庄严,尽量寻找合适的山洞来保存。战争时期,山洞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可以避免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这一时期,除了找寻理想的库房选址外,对于故官博物院来说,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抢时间,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存放在南京朝天宫库房里的文物运出来。二是抢运输工具,尤其是到了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已经打响,城内外的运输工具都以军事运输为优先。

故官文物陆续抵达了贵阳、重庆和成都之后,最初以为已经运抵了相对安全的城市。但是,随着1938年10月武汉的沦陷以及1939年3月日军准备无差别轰炸重庆计划的暴露,故官博物院迅速做出反应,找寻库房,征用车辆,租借船只,坚决不能让文物暴露在日军的轰炸机下。存放在西南三大城市的故官文物再次向内陆偏远地区转移,辗转运至安顺、乐山和峨眉保存。

记者:西迁南路的一些文物参加过英国和苏联的展览,这些文物有什么特点?特别是在重庆和贵阳等地也办过展览,这些文物参展和办展览有什么意义?

徐婉玲:在迁徙途中,故官文物多次参加国际和国内展览。西迁南路文物中有700余件曾去过英伦展览,都是当时在上海库房里挑选出来的精品,足以代表中华文化。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近代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时,故官博物院提选的700余件文物是整个展览的精华所在。正因为这样,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故官博物院理事会当即召开会议,决定将这批文物运往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保存。当时,理事会还决定一并转移一部分青铜重器和宋元书画,包括对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散氏盘和嘉量,以及紫禁城三希堂所藏稀世珍宝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1939年4月,故官博物院从安顺华严洞库房文物中拣选了2箱精品,参加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由于路途遥远,挑选的文物大多是便于携带的书画和织绣以及比较皮实的小件青铜器、瓷器、玉器等。

1943年冬,故官博物院又从华严洞库房提选了142件书画,由庄严等人将其押运至重庆中央图书馆展览,展览分两期举行。虽处战争时期,但展览会仍然引起了轰动。

1944年4月,故官博物院在筑书画展览会在贵阳举行,受到广泛关注。

即使身处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故官博物院也没忘记播撒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故官文物赴英国和苏联参加展览,更多的是出于文化外交的目的,为使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神美,引起世界民众对中国抗战之同情。在西南地区的几次展览,则是出于提振士气,表达抗战必胜的决心。

记者:作为新一代故官人,您如何看待抗战期间文物南迁的历史?这段历史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

徐婉玲:今天的故官人,与前辈先生们一样,承担着保护中华文化遗产、守护中华文化根脉的责任。

在战争时期做出文物迁移保管的决策,其本身就是不容易的,在这些过程中所进行的打包装箱、迁移运输和点查整理等工作,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和启示。例如文物囊匣的制作,可以防止运输过程出现损伤。又如文物账册的登记。故官博物院里存有几套大型文物账册,最早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的《故官物品点查报告》,点查文物117万余件。然后就是《存沪文物点收清册》,我们一般称它为“沪上寓公账册”,这是故官文物存放上海时期文物保管的一套重要的账册记录。马衡院长以“沪上寓公”对应四个部门保管的文物,即古物馆文物编号“沪”,图书馆文物编号“上”,文献馆文物编号“寓”,秘书处文物编号“公”,连起来即为“沪上寓公”。

再者,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是应对战争局势紧张时的文物抢运,还是面对典守岁月里的清贫生活,前辈先生们始终保持着一份豁达乐观。他们是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者,既要考量文物的安全,又要突破自身的学识和能力去做事。从运输环节到保管的事项,一步一步落实,令人感佩。也非常感谢贵州等各个地方给予的支持,在危难中相互扶持,同心保护中华民族的瑰宝。

故官文物历经10余年颠沛流离,最终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奇迹,承载着深刻而隽永的民族记忆。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姚曼

## 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

故官博物院研究馆员、档案馆(院史陈列馆)副馆长徐婉玲